

José Marià Alvarez

的《福爾摩莎，詳盡的地理與歷史》

吳孟真 李毓中**

第一章史前時代至十七世紀*

第三節

西班牙遠征佔領福爾摩莎企圖數次落空—1626年登陸基隆—建造聖·薩爾瓦多(San Salvador)城—與原住民為友—西進冒險以及在淡水建造聖·多明哥(Santo Domingo)城—1629年荷蘭人進攻淡水—原住民所造成的死亡及其懲處—擁有福爾摩莎的美好遠景

十六世紀末西班牙一鞏固征服菲律賓的行動後，就開始將其仁慈的目光投向在邪惡魔王(Luzbel)控制下的鄰近部落，以便宣揚天主的國；因為在記憶中快樂的日子裡，每個西班牙人都是傳道者，每個勇敢的艦隊都是一個使節團。他們知道向他們所接觸的人傳達他們宗教信仰的熱忱，在他們的言談中，不知有另一個法典、統治者與自由，一心奉行「我的宗教、我的祖國、我的國王」這樣的神聖格言；他們驕傲地銘記這一格言，這讓他們在戰役中無往不利，卻不因這些勝利而驕矜。

馬上喚起西班牙人注意的其中一點，即是福爾摩莎島的重要性，其地理位置讓它隨著時間發展，可以成為貿易的樞紐和前往中國及日本傳教的中心。所以，西班牙人試著派遣船隻跟鄰近地區建立貿易關係，探索土地資源，同時也不忘向遠古便居住在該地的愚笨居民宣揚天主教。如同當時所見的，發現者葡萄牙人因為忙於擴張殖民地，勢力逐漸衰微，無暇顧及福爾摩莎島；而荷蘭人在1590年時仍未嶄露頭角。此時，福爾摩莎除了擁有中國海盜和日本商人使用的兩個港口和野蠻的原住民外，沒有其他的居民，正等著一隻

* 本文的得以完成必須感謝林玉茹、詹素娟教授的諸多指點。

** 吳孟真為輔仁大學西班牙語文學研究所碩士，現為蘭陽文教基金會專案人員；李毓中現為西班牙塞維亞大學美洲史(含菲律賓)博士候選人。

友善的手將他們帶離遭棄的命運，讓他們知道所謂的物質發展，同時啓蒙他們這些野蠻未開化的人，讓他們了解何謂尊嚴，引領他們心中的渴望到最終點。這一光榮及非常人道的任務，依照上帝的旨意是為聖王中，仁慈平和的菲力普四世(Felipe IV)所統治的西班牙而保留。當時在菲律賓群島打前鋒的是熱愛祖國、虔誠的總督費南度·德·西爾瓦(D. Fernando de Silva)。在此同時，道明會(Orden Dominicana)剛完成遠東第一個有其歷史重要性的文化中心，聖·多瑪斯大學(Universidad de Santo Tomás)的創立。這一大學的開始因有為人稱道的恆心及受祝福思想的支持，所以至今不斷成長。

事實上，在菲力普二世統治期間，西班牙就曾經企圖征服這個珍貴的島，並且確實準備了船隻航行海上，但是不幸地在經過馬里威列斯(Mariveles，譯註，位於馬尼拉灣出口的北方)角時，便遭到強大暴風雨的襲擊，在馬尼拉海域受阻，因此此事只好延宕以便等待更好的行動時機。「阿度阿爾特主教先生(Aduarte)寫道，西班牙國王，是企圖佔有福爾摩莎的第一人。在這一影響及國王的命令下，3艘載有武裝設備並配有200名人員的船艦，由搭乘聖·菲力普(San Felipe)號，來自孟特雷(Monterey)伯爵家族的胡安·薩馬德斯(D. Juan Zamadés)騎士的率領下，於1593年前往菲律賓。但是遭到一場巨大的暴風雨，其中兩艘遭擊損而第三艘沉入海底。

稍後，在1626年福爾摩莎成為成就西班牙傳教士與軍人的光榮舞台」。¹

我們也見識到日本太府大人(Daifusama，譯註，應是指德川家康)如何在1616年有強大武力卻因暴風雨重創他的船隻打亂他的計畫而無法奪下福爾摩莎島。之後荷蘭人在福爾摩莎島的西南方取得據點，從這裡他們阻斷西班牙加雷翁(galeon，譯註，或譯為大帆船)航往阿卡普爾科(Acapulco)必經的航道，並禁止眾多舢舨(champan)駛離中國，為菲律賓群島帶來另一個持續性的威脅。

1 引自Historia de la Provincia del Santisimo Rosario, parte I.^a, lib. 2.º。在塞維亞的印地亞檔案館(Archivo de Indias de Sevilla，今日稱之為印地亞總檔案館)可以找到許多相關的文件，見Estante 67, cajon 6, legajo 18。

在法蘭西斯克·特憂(D. Francisco Tello)總督一封向國王報告近況的信中提到日本為攻打卡加揚(Cagayan)和馬尼拉所做的準備及為討論此點所召開的戰爭委員會(junta de

因此，必須在福爾摩莎島取得一港口的舊想法再次被提出，並且認為執行此項重大任務的最佳人選莫過於道明會教區(Provincial de los Dominicos)的巴特羅美·馬地涅斯(Fr. Bartolomé Martínez)神父。他曾於1619年前往福爾摩莎島並寫了一份報告呈給最高當局(Superior Gobierno)，以便當局儘早涉足此島建立具戰略地位，適合日後宗教與商業計畫發展的據點。

由於1618年6艘荷蘭私掠船出現在馬尼拉海岸，菲律賓總督因害怕失去中國市場運來的諸多有價財富，於次年便派遣上述的馬地涅斯神父前往廣東(Cantón，譯註，此處指廣州)及漳州(Chang-chiu)一帶的港口，請求中國官員禁止商船離港貿易，好截斷荷蘭人的生路。

在船駛離菲律賓海域之前，他們遭到一場暴風雨的襲擊被迫擱淺，在歷經萬難後，馬地涅斯神父一行方從支離破碎的船隻中脫困，撿回一命。他們在馮嘉施蘭(Pangasinan，譯註，位於呂宋島北部偏南的海灣)地區等候命令，之後搭乘馬尼拉政府所派遣的另一艘船再度展開旅程，但是這次的運氣跟前次航行同樣糟，幸好隨同聰穎的船長加斯帕·德·努涅斯(Gaspar de Niñez)認出船隻所停的海岸正是福爾摩莎島海岸；所以，西班牙人以「奧古斯都祖國」(augusto de patria)之名，神聖佔有該區域。

guerra)與佔領福爾摩沙島的計劃－1597年5月14日於馬尼拉。

致國王的信件中報告，日本繼續企圖佔領福爾摩莎島計劃的消息；提及日本所做的準備，並說如果能給他，他先前向新西班牙(Nueva Espana)所要求的援助，他將不怕日本的來襲－1597年6月19日馬尼拉。

奉法蘭西斯克·特憂總督之命在馬尼拉召開的戰爭委員會決議副本，於討論後提交了一份報告給路易斯·達斯·馬尼釀斯(Don Luis Das Marinas)，說明必須先日本人佔領福爾摩沙島的原因－1597年6月22日。

費南度·德·盧斯·里歐斯·克羅涅爾(Fernando de los Rios Coronel)的信；他是一位模範世俗教士(譯註，指不屬於任何教會組織的傳教士)，發明用來測量地點、邊界的占星工具，以其數學及占星學上的成就聞名，曾提到西班牙佔領福爾摩沙島的重要性及其他與地理發現相關的議題。隨信附上由他本人所製的彩色福爾摩沙島、呂宋島及中國海岸線地圖一張－1597年6月27日於馬尼拉。

太閤大人(Taikosama，譯註，指豐臣秀吉)所做的使馬尼拉陷入困境，就向總督法蘭西斯克·特憂(D. Francisco Tello)在最後一封信所說的一樣：「據說，昨天，戰爭委員會(Junta de Guerra)已對於路易斯·佩列斯·達斯·馬尼釀斯(Don Luis Perez Das Marinas)所提前往福爾摩沙島的請求，作出決議。這一決議就是國王陛下會看的證詞。雖然，一此決議，我已下令做所有該做的事，但我仍手持探測器直到墨西哥人員和金錢的支援抵達；沒有這些援助，就無法打仗。」

回到馬尼拉後，馬地涅斯神父寫了一份報告，這一報告現在保存在聖·多明哥(Santo Domingo)修道院的檔案館裡(譯註，馬尼拉的道明會修道院，已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毀於美軍的轟炸)。在報告中，馬地涅斯神父建議儘早取得福爾摩莎島的必要性：「第二點：據許多離開這個港口的中國人及葡萄牙人向我證實，如果馬尼拉方面先在福爾摩莎島設立據點，該地必然是這一帶土地上，最富裕、最主要乃至於最安全的貿易點之一，因為它是如此地接近中國的富裕地區，在那裡，很短時間就有許多滿載財富的船隻通過」。第十七點則寫道：「重要的是要儘快進行，因為耽擱越久，該土地將因被別人搶先取得而減少，且無法對該島嶼進行航測及同時設立據點，因為日本人及荷蘭人會獲知消息並阻止我們的行動。日本人已經在那裡進行大量貿易，而荷蘭人也確信想設立據點並且一旦他們獲知馬尼拉方面也想在那裡設立據點，他們或許會搶先行動或竭力求阻止我們的設立；在澳門的人們非常擔心荷蘭人在福爾摩莎島設立據點，因為一旦他們設立據點，澳門只有被毀滅而印度(India，譯註，此處泛指東亞)貿易自此也將結束。據說荷蘭人企圖在福爾摩莎島緯度24度的地方設立據點，並由該地派遣他們的艦隊前往中國，恐嚇、威脅中國人說：如果中國人前往馬尼拉，荷蘭人將取其性命財產；要他們轉往福爾摩莎島，荷蘭人會在那兒與他們交易」。之後，馬地涅斯神父還補充說：「如果荷蘭人此時正好與英國人發生戰爭，那麼現在絕對不失一個設立據點的好時機，因為沒有人可以阻止我們」。

馬地涅斯神父從一開始就用以下敘述指出最適合建築要塞的地點：「為了使馬尼拉得以保有此貿易且還會巨幅成長，且在那裡可以免除遭到荷蘭人或其他海盜們掠奪的危險，在福爾摩莎島據說有一處適合建造要塞稱為北港(Pacan)的港口，這一港口將會是許多財富的開始」。

受到道明會士們的忠告及協助的鼓舞，熱情的總督費南度·西爾瓦開始著手此工作並且為了讓這大膽的企圖有美好的成果而作準備。當時蠻橫的荷蘭人叫囂一戰，是許多西班牙船隻的夢魘。就像馬尼拉法院官員迪亞哥·德·卡斯特羅·里松(Diego de Castro Lisón)、胡安·盧易斯·德·埃斯卡羅那(Juan Ruiz de Escalona)及馬丁·盧易斯·德·薩拉查(Martín Ruiz de Salazar)等人在一份日期註明為1624年8月10日呈交給國王的報告中所指出的一樣。

「據說，荷蘭人已經在福爾摩沙島及澎湖島進行構築防禦工事，所以中國船隻無法抵達這些港口，荷蘭人的目的就是在要阻斷菲律賓群島的商業貿易，這是最容易上手的方法。所以若不趕緊想法子阻止荷蘭人，一切都太晚了。」²

菲律賓總督費南度·西爾瓦於1625年8月4日寫信給他的國王提到：「福爾摩沙島在大中國及菲律賓群島的伊洛戈(Ilocos)省份之間，島與島間距離如此地短只要一個晚上便能橫渡抵達。雖然在我的前任者-阿瓦羅·發哈爾度(D. Álvaro Fajardo)執政時期，就有人提醒他荷蘭人試圖在福爾摩沙島建築工事並提醒他取得這些島嶼港口的重要性，他並沒有理會，也許是心有餘力不足吧！但，現在荷蘭人已有一個四個菱堡的要塞，其中二座是石造的且在脫離中國皇帝統治的中國遊民協助下，很快地完成該建築工事，該處雖然無法停靠大船但可以小船進出；若再加上日本船隻的進出，損失以相當可觀。甚至去年就有一艘有30,000披索(pesos)價值的船隻抵達該地。若給我時間和機會，我會試著取得不同的港口，以便在未來將荷蘭人驅逐出目前所在地。託陛下的金口，這將是福爾摩沙島全面的光復，恢復其舊有榮耀甚至將之發揚光大。」³

巴特羅美·馬地涅斯神父是遠征隊的靈魂人物，雖然菲島教區最高當局非常需要他待在那裡，但對於委員會(Consejo)視馬地涅斯神父的存在對西班牙利益更重要的決定毫無異議，所以准許他離開菲島參與此次遠征。因此教區會議記錄(Actas del Capítulo Provincial)如是寫道：「鑒於此次行動的重要性和受人尊敬的教區神父(el M. R. P. Provincial)-巴特羅美·馬地涅斯神父在此次行動中的必要性，馬地涅斯神父必須參與此次遠征，以便讓事與願合，整個結果與我們所想的一樣；使中國人為了他們敬愛的神父，心甘情願地到福爾摩沙島作聖神的喉舌與使徒，與西班牙人合作開始跟此片土地相關的作業及至日本、中國傳教。」由勇敢的士官長(sargento mayor)安東尼歐·德·瓦德斯(D. Antonio de Valdes)統率，加上其他三位隊長及其他小隊士兵、教會代表-馬地涅斯神父和其他五位來自道明會的修士，還有總艦長-知名的佩

2 參考印地亞檔案館, Filipinas, legajo 30。

3 參考印地亞檔案館, Estante 67, cajón 6, legajo 18。

德羅·馬丁·德·加賴(D. Pedro Martín de Garay)，成立了一由兩艘配備完善的加雷翁艦及12艘中國舢舨組成的艦隊，於1626年2月8日起錨，但直到該年3月5日，艦隊還是沒有在卡加揚(Cayagan，譯註，此處係作者的筆誤，應為Cagayan，位於呂宋島最北部)出入口著陸，艦隊在此奉命等待有利風向轉變，將他們順利送上福爾摩莎島危機四伏的海岸。

艦隊是帶著秘密的命令離開馬尼拉，連組成該批遠征隊的士兵們對此都一無所悉；在抵達依巴那戈(Ibanag，譯註，在卡加揚地區)河，等待季風，停止艦隊航行後，他們就以為抵達終點，隨後為了要嚴懲當地曼答牙斯(madayas)部落的叛亂行為(當時他們起而反抗西班牙政府)，組成征討部隊進入該地山區。

在追擊這些叛亂份子至他們的隱密住所，並且在為佛托(Fotol)及卡必拿坦(Capinatan)(譯註，兩地皆位於卡加揚地區)兩地受害的死者適當的報仇後，勝利返回據點的遠征軍，被告知他們離開馬尼拉的主要目的是前往征服福爾摩莎島。

糟糕的是遠征隊在收到這意想不到的命令後，感覺受騙，若不是傳教士們有說服力的解釋，及時壓制這個已有徵兆將演變成狂暴大火的叛變火苗，士兵們可能不會服從最高當局這一命令。

爭端平息後，他們於5月4日揚帆出發，為了不與兩年前就佔領統治福爾摩莎島西南大員(Tai-uán)港的荷蘭人相遇，遠征隊經由福爾摩莎島的東部航行，經過3天順利的航行後，抵達一處距離北點(punta N.)10里格(譯註，約55公里)的地方，佔領該地並將該地命名為聖地牙哥(Santiago)，該地名至今仍保留，只是現在這些中國人稱它為三貂角(Sam-tiau)。

在設立據點前，西班牙人先探勘港口並尋找最符合需求的地點，以便設立城市使他們得以安全地防禦荷蘭人和虎視眈眈海盜們的攻擊。他們在更北一點處，即基隆港或稱為北港找到地方：該港是福爾摩莎島內最深、最適合防守的港口，因此艦隊及所有人員都移往該處，並著手開始西班牙人對此地的統治，這一切是在相當輕鬆及短暫的時間內完成。

馬尼拉高等法院官員胡安·盧易斯·德·埃斯卡羅那、馬丁·盧易斯·德·阿雅拉(Martín Ruiz de Ayala)及克里斯托巴·德·墨卡度(Cristóbal de

Mercado) 在一份日期為1626年7月26日向國王報告菲律賓相關事務的信中提到：「1626年5月12日已為陛下取得福爾摩莎島的一處港口，在那兒，目前由一名大隊長(cabo)及三名隊長統領，有200名步兵和12座大炮。您必須了解，若保有該地，對此共和國(指菲律賓)將是非常有利的。往新西班牙(Nueva Espana)的船將設法載運補給至福爾摩莎島」。⁴

基隆港的入口處，有一座高約300呎(約84公尺)、周長(bojeo)約1里格(約5.5公里)的小島，今日以日本人命名之社寮(Siaryo)聞名，由一個狹小的水灣將其與陸地分隔，西班牙人就是在該地找到非常適合興建西班牙要塞的地點，他們建造了一些要塞保障他們的安全，因為除了野蠻原住民不斷設下圈套捕捉他們外，外在的敵人也不停地追擊他們。

西班牙人稱這個港口為聖千里達(Santisima Trinidad，譯註，或譯為至聖三位一體)，他們設立據點的那個島，則命名為聖薩爾瓦多(San Salvador，或意譯為聖·救世主)；西班牙人開始在靠海邊的原住民小村落搭蓋起房舍，用一些土堆起戰壕，上置放射程已調好，可隨時給予任何想要爭奪該地的人迎頭痛擊的火炮，此外，傳教士們還蓋了一間教堂獻給所有聖者(Todos los Santos)；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征服行動沒有造成任何傷亡，在原本已居住在該地有一定數目的原住民、中國人及日本人等住民們間也沒有引起任何激烈反對。於是，西班牙金黃及紅色交織的旗幟，就這樣優美地開始在那臨時搭建起來的城垛上飄揚。

必須一提的是，事實上，這些膽怯的島民們在聽到這些勇敢的西班牙士兵抵達海灘時所鳴放大炮的巨響聲時受到驚嚇，紛紛放棄他們住所躲到山裡；一直到他們早先因大炮巨響所造成的恐懼解除，又被想要感化他們，向他們宣揚天主教的教士所尋獲並受其吸引，這些人才開始接近西班牙人，跟他們作朋友。而西班牙人非但沒有凌虐這些原住民，反而給予他們全心的恩惠與溫情。

當時在基隆已經有一定數目的中國及日本商人，而他們的市集就正對朝東所提過的小島(和平島)；該據點之後被傳教士們稱為中國人的巴利安(Par-ián de los chinos)，因為在馬尼拉也是用同樣的名字來稱呼中國人居住的地

4 參考印地亞檔案館, Filipinas, legajo 30。請參考附錄II。

方，這一地方大約就是今日中國人稱作砂船頭(Soa-chun-tau)（意為碼頭卸貨的地方，譯註，應為今日大沙灣一帶），在法國士兵公墓旁，現在基隆的日本人居住處。

一取得港口，巴特羅美·馬地涅斯神父就隨「遠征軍的主力」返回馬尼拉，在那兒，教區最高當局需要他出席選舉，但一把管理工作與職務轉交給他人處理，馬地涅斯神父就返回他心愛的福爾摩莎島教會，那裡需要他與中國人往來，因為他熟用中國話。

開始前三年，值得一提的事很少，都只是防禦以待荷蘭人可能的攻擊。西班牙人在聖薩爾瓦多島建起堅固的菱堡，在陸地建了另二座，在面海處也立了一座，還有在入口處，也就是在前方陸地跟其他二座碉堡平行，阻礙所有通道處設立了一座碉堡。此外，在中國人的巴利安，還有第六座碉堡。每一個要塞都配有相應的戰壕、柵欄並配有充足優良的加農砲。如日後所見，荷蘭人日後並沒有被這同一批西班牙人擊潰，也沒有毅力防守福爾摩莎島，所以也就沒有機會再這些西班牙要塞上揮舞他們荷蘭的旗幟，大大羞辱了他們的祖國。

完成建構這些防禦工事並取得海灣附近一個個村落對西班牙統治的承認即因傳教士的熱心對天主教的接受後，西班牙人打算拓展他們的活動範圍並將其他離聖千里達港更遠的地方也納入西班牙統治之下。

由於荷蘭人已經在福爾摩莎的大員構築了防禦工事，且獲得來自雅加達(Jacatra)的援助，對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及中國人而言，在亞洲東方海域航行的危險已增加許多；因為每天都得冒此風險，西班牙人為此感到痛苦，所以決心解決此一問題，在福爾摩莎北部設立一據點，但事實上他們真正想做的遠超過這個，就像當時文件所記載的：是將荷蘭人逐出福爾摩莎島。

在基隆設立據點後的一年即1627年，新的菲律賓總督胡安·尼紐·德·塔佛拉(D. Juan Niño de Tabora)親自率領，武裝了一支有8艘船，配有136門銅製大炮及2,015名戰士的強大艦隊。「這一艦隊已籌備及整裝了六個月。」其目的在於「支援及加強在福爾摩莎島國王所擁有，命名為聖薩爾瓦多城的要塞防禦，並加強鞏固與中國人和其他與皇家事務(Real Servicio)相關事務的重要來往」。⁵

1627年8月17日該艦隊出航駛離甲米地(Cavite，譯註，位於馬尼拉海灣口南方)，但是由於海象不佳，被迫返回馬尼拉，無法執行該項遠征計劃，不然的話，這或許會在在西班牙歷史上創造光榮的一頁。

耶穌會科林神父(Colin, S. J.)寫道⁶：「新總督胡安·尼紐·德·塔佛拉於1626年6月29日抵達馬尼拉，與他一同從墨西哥出發的還有一些法蘭德斯(Flandes)的隊長，其中有羅倫索·歐拉索·德·歐秋特奇(D. Lorenzo Olaso de Ochotegui)，他是支援部隊的隊長，領有作戰專家(Maese de Cam-po)的薪水，下轄600名壯勇猛的士兵」。

「對荷蘭人動靜的瞭若執掌，加上造船廠隨時待命，使得西班牙幸運地從未缺少8艘高舷戰艦。所以對總督胡安·尼紐·德·塔佛拉而言，對抗福爾摩莎島上荷蘭人的任務他是勝任愉快」。

「二艘從阿卡普爾科(Acapulco)來載胡安·尼紐·德·塔佛拉和其他人員經聖·胡安(San Juan，譯註，位於今日美國加州)到台灣的船艦停泊在此時，當時有三個方案提出：一是將荷蘭人逐出福爾摩莎島大員(Taiban)港或馬拉優(Malayo)的摩鹿加(Maluco)群島，再不然就是為費南度·德·西爾瓦(D. Fernando de Silva)(譯註，與前總督費南度·德·西爾瓦同名的一名船長)之死向暹羅國王報仇。最後(印地亞)委員會委員裁決第一項方案。」

「從新西班牙來的援助抵達的非常晚而且與當初總督所允諾的差距甚大，所以大型武裝船隻和戰艦田了整個七月到八月中旬才一起自甲米地(Cavite)港啓程至阿卡普爾科(Acapulco)。接下來的航行非常順利。大型艦隊在波赫阿度(Bojeador，譯註，位於呂宋島北方卡加揚地區)角籌設北方的據點，與其航行的目的相背。

在惡劣天氣下逆風航行數天後，考量到保存菲律賓群島是第一要務，皇家法院首長(即菲律賓總督)在協定中被要求在抵達馬里威列斯(Maribeles)前上岸，最後該遠征艦隊因天候不佳自波赫阿度角(Capo Bajeador)退回結束該次遠征。

5 請參考附錄二。

6 見Labor evangelica, lib. Io., cap. XXIV。

馬尼拉高等法院官員胡安·盧易斯·德·埃斯卡羅那(Juan Ruiz de Escalona)及馬丁·盧易斯·德·薩拉查(Martin Ruiz de Salvador)，在1628年7月31日寄給國王報告馬尼拉事務的信件中提到：

「與總督胡安·尼紐·德·塔佛拉一起出發前往福爾摩莎島的艦隊因天候不佳返回甲米地港中斷航行」。

「由於船艦太大無法停靠，也無法在島嶼間暫停，再加上水流太強及許多風險更無法靠港停船」。

「行於武裝船艦前的兩艘加里翁船在惡劣天氣下行經伊洛戈(Ilocos)海岸，抵達觸目可見福爾摩莎島的地方，而且沒有任何人員或火炮的損失」。⁷

馬地涅斯神父知道在基隆西邊約7里格(38.5公里)處有一港口稱為淡水(Tanchuy，今日的Tamsui)，該地是最靠近中國之處且經常有一些商人在那往來，所以馬地涅斯神父與該地要塞長官(Goberador，或譯為都督)安東尼歐·卡列紐(D. Antonio Carreño)討論達成協議在荷蘭人將淡水列為囊中物前將該地置於西班牙旗幟下，因此兩人一致同意派遣一隊士兵於1628年佔領上述地方。

據說在上岸時，西班牙人曾與荷蘭人在該地巡邏的船艦展開小規模的戰鬥，荷蘭人在當時已取得距離淡水約15里格(82.5公里)，今日稱為新竹州(Sinchiku)，他們稱之為Zant(譯註，原文照抄)的地方；但事實上，這並非如此重要，一直到1629年荷蘭人攻擊行動前，充滿榮譽心的西班牙士兵們，在福爾摩莎水域並沒有遭遇到任何的衝突。

「根據道明會教會史所言，淡水城是與中國貿易主要且關鍵的港口，而西班牙殖民當局在一般事務上，始終堅信淡水是最重要的據點。因此在該港口興建起一座非常重要的要塞，而且我們的傳教士也在那裡建造起一座主的教堂；此外考慮到臨近的荷蘭人，他們仍擔心這些防禦工事仍不足以保障安全，將遭到一些攻擊」。

「傑出的巴特羅美·馬地涅斯神父在結束他原教區職務回到他征服之地後，便加強鞏固經他取得之地的最後防務，他早已知道可能有的危險，這並無法逃過他的法眼。為了安全，他全心全力投入加強防禦與所統治城市同名

7 參考印地亞檔案館，Filipinas，legajo 30。

的淡水碉堡。在當時這一防禦措施是正確合宜的；因為當大炮方向瞄準好而城堡內所有軍事設施一切就緒時，在淡水水域就突然出現三艘配有驚人火砲的可怕戰艦，這些荷蘭艦隊是為了爭奪我們在福爾摩莎的軍事據點而來」。

「這個態度傲慢的艦隊先傳達的要求及信息是將炮彈射向我們的廣場。淡水菱堡則以猛烈炮火轟擊回應荷蘭人的要求，以無比勇氣接受他們的挑釁，百門炮火齊開以便將該艦隊摧毀擊斃致死。砲彈如同兩座火山一般同時爆發，兩團雲霧同時自高空落下散開；撞擊聲劇烈，戰火下，火花四射，如雷轟頂的淒慘景象忠實呈現了激烈的戰況。最後，荷蘭人的戰艦停火而它驚人的火砲也不再回應西班牙菱堡的火力，因為荷蘭人的船隻再也無法承受如此猛烈的轟擊。當在浩劫般的戰鬥一開始時就籠罩而下的厚重雲霧散開後，只見這三艘龍骨已受損的荷蘭海盜船遁逃至遠處海平面上」。

荷蘭人好不容易才得以脫險逃跑，茫然羞恥地躲藏在大員島。打敗敵人，確保淡水要塞安全後，要塞長官及巴特羅美·馬地涅斯神父設法帶著一小部份軍隊返回聖·薩爾瓦多港。事實上，他們所搭乘的是一艘單帆划槳的輕舟。當他們在聖·薩爾瓦多港登岸時，本來已克服了許多大浪的船隻不幸地被一個突來的浪迎頭重擊沉沒，使得此事件不幸有三人喪生，其中之一即是巴特羅美·馬地涅斯神父。與他同行的同伴曾想盡各種辦法，甚至冒著自身生命危險救他脫離險境，卻無法如願。最後該場重大勝利變成一場喪禮，當聖薩爾瓦多城的駐軍準備以禮炮歡迎勝利之師時，所接到的卻是一樁哀戚肅穆的喪禮，只有痛苦和淚水相伴。⁸

8 請參考P. J. Fonseca的Historia de la Provincia del Santísimo Rosario, lib.3, cap. V。

歷史學家對此淡水港以及1629年成功防禦荷蘭人的戰役留下了極精彩的描述，但是此說法部份有誤即：「此港是與中國極重要及主要的港口...並且是殖民當局的駐紮地」。其實這些描述是指基隆港或稱為至聖千里達港；其實在當時淡水是非常簡陋的，就像曾親眼目睹的奇洛斯(Quirós)神父所說明的；該地是一個原住民村落，加上3或4間中國商人的臨時茅屋。這些中國人為西班牙人運來稻米及一些物品並用一些布匹及小玩意兒和原住民交換硫磺、用來製造棺木的珍貴木材、鹿皮及鹿角以及一些醫藥植物。受洗名為聖·多明哥的要塞係一個以木樁及竹竿搭成的圍柵要塞，堆有一些土埂以便安置火炮，並有一些房舍及臨時的貨倉供該長官及少數士兵居住，該要塞最後於1639年棄守。

這場戰勝三艘荷蘭戰艦的戰役是全面的；是由如此少的人在資源相當貧乏的情況下所完成，是一場相當顯著決定性的勝利。

獲得這次傑出勝利後，西班牙殖民地感到非常地興奮，而荷蘭人有12年都無法忘懷這一次所受到的嚴重教訓，不再企圖重蹈覆轍，一直到晚期因西班牙人不想再保有該殖民地變得自暴自棄與懶散，他們(荷蘭人)確信能取得最後勝利才再有所行動。

1630年6月30日菲律賓總督胡安·尼紐·德·塔佛拉寫給國王，如是說：「在福爾摩莎島出現了相同的新危機(日本派出一隻大艦隊攻擊馬尼拉報復1628年西班牙人在泰國一處沙洲上焚燒一艘日本戎克船，必須加快鞏固淡水防禦工事，而負責當地事務的胡安·德·阿卡拉索(D. Juan de Alcarazo)長官寫信給我時提到，雖然該艦隊據說有40,000人員傾力而出，很幸運地我們西班牙士兵仍盡忠職守，無懼這些日本人)。

「如果荷蘭人向去年，一樣攻擊淡水就必須特別注意。我正在準備物資，不是因為有這要求需要而是因為從新西班牙來的援助太少」⁹

控制淡水河口的要塞建在小山丘上，以土石和木樁排建造而成，在上面放置了幾門大炮，並受洗命名為聖·多明哥(Santo Domingo)，為了防禦該地，少部分的駐軍留下。大約在1630年駐守該地的是路易斯·德·庫斯曼(D. Luis de Guzmán)，一個熱心於主的榮耀及愛國的人；所以四處可見西班牙旗

9 參考印地亞檔案館，Etante 67, cajón 6, legajo 8。

日期註明是同年(1630年)8月4日，他寫給國王的回信這麼說：「與大中國福州(Ocheo或Focheu)總督(原文寫作Virrey，為副王之意)已有接觸並談及與該地區進行貿易等事務，該處位於我們在福爾摩莎島上新的聖·薩爾瓦多港口對面，非常的富有；他寫信給我並許諾給予協助，胡安·德·阿卡拉索長官獲令前往其邸拜訪，希望我們能達成所願，雖然至今在中國，對於准予西班牙人進入中國仍存在一些困難，但預估將會更有希望…」。

「力圖謀求使台灣島上的原住民皈依天主教服從我們的陛下，雖然至今仍原住民未完全歸順，但在最近一艘船送交給我的信中提到，目前已有超過300人受洗接受天主教的信仰；聖道明會的傳教士們為此努力不懈，希望未來原住民都能接受我們的主」。

「替這個新開闢的城鎮送一些婦女，會使那裡更好且有希望，這裡將…」。

「同一批中國人告訴我們，荷蘭人正處於非常衰弱的狀況，主要原因是一艘船正在燃燒另外還有兩艘船在那裡，該地要塞非常地缺乏人員，為了這一損失，雅加達方面以一艘大船運來援助，但是該船在今年五月在距離麻六甲(Malaca)不遠的Xambi(原文照抄)港遭尼紐·阿瓦列斯·波特優(Ninõ Álvarez Botello)焚燬，。此時正是進攻福爾摩莎島上敵人及將他們逐出的最佳機會(如果擁有這些重要的要塞的話)，讓他們無法進行與中國的絲綢貿易，這正是他們在那裡的目的。隨著該艘福爾摩莎島船隻的到來並獲知來自印度及澳門的船隻將於八月抵達，此城市目前有充足的貨物但也缺乏貨幣因為本地已用在雇用附近地區人民身上」。印地亞檔案館，Etante 67, cajón 6, legajo 8。

幟飄揚，他此時雖然無法降服這些野蠻原住民村落或部落，卻無時無刻不設法努力使他們更加文明並接受天主教洗禮。聽到隆隆炮聲原住民逃離淡水而深入淡水河內流域幾里格苦苦尋找他們的是那些傳教士。在減少原住民的恐懼與之建立友誼後，傳教士方在他們的村落裡建造一間小教堂獻給羅薩里歐聖母(Nuestra Señora del Rosario)。距離現在的淡水港約一里格多處，大約自河流的左手邊溯流而上，離今日一處被中國人稱之為埤頭Pia—tau(譯註，可能為今日之埤島里)的村莊再遠一些的地方有一座被樹及花所覆蓋的小山，那裡即是西拿(Senar)村落位置的所在。在那兒，都督及士兵們列隊依序伴隨聖母瑪麗亞像到場，以盛大隆重的典禮替該地的小教堂進行開幕，讓那些可憐的偶像崇拜者因天主教儀式的威嚴雄偉而為之感動。

胡安·的·阿卡拉索(Juahn de Alcarazo) 在1630年於基隆接替首任福爾摩莎都督安東尼歐·卡列紐(D. Antonio Carreño)的職務。兩年後，他在胡安·德·瓦克達諾(Juan de Vaquedano)船長的陪同下前往馬尼拉；毫無疑問的這趟旅行是為了設法替福爾摩莎增加防禦而去，又或許是為了跟那些年在委員會(譯註：印地亞委員會)多次討論過的一般，聯合澳門的葡萄牙人一同驅逐福爾摩莎島上的共同敵人荷蘭人這一目的而前往。雖然西班牙人及葡萄牙人並沒有到裸裎相見的地步，但二者彼此了解和互助的程度遠比先前制此的征服者多很多。¹⁰

在此時，西班牙人已經與基隆港兩邊所遇到的許多原住民村落建立友誼。

金包里(Kimauri)與沙包里(Taparri)的原住民因住靠近西班牙人，及擁抱天主教信仰而在我們的歷史留下難忘的記憶。根據艾斯奇威爾(Esquivel)神父的記載：「沙包里是一個集合約四到五個村落的聚落，目前約有千餘名原住民居住。沙包里和金包里的原住民都住在海灣內靠近西班牙人的據點，他們是海盜，所住的島就是西班牙人興建城市的地方」。

10「1627年由於擔憂與敵方荷蘭人交戰的澳門情況，在士官長費南度·德·西爾瓦費(譯註，與前總督費南度·德·西爾瓦同名)率領下為澳門運去支援人員、火炮及軍需品。大約一年後派遣一艘船前往那裡以便載回原本所需的步兵；然而該港口正苦於沒有船前往其港口，為了能夠解決此困境，將上述這艘船派遣出航，該船在回航時遭遇到極惡劣天候被迫停靠在泰國，該地荷蘭人有代理人駐在該港口內。在那極不便利的沙洲 和新的氣候下，我們失去那艘船及部份已經運上船的財物」。印地亞檔案館，Filpinas, legajo 30。

金包里村落如同上面所說的，面向馬尼拉在基隆東方，而沙包里則是在朝向荷蘭人位置的另一邊，也就是朝向西北，在一個拐彎處稱之為馬蘇(Masu)半島(譯註，應為今日野柳一帶)的地方。不論是住在基隆附近的原住民或是散居在海灣直到淡水的二或三個部落居民還是在淡水河或是西拿河邊的原住民都是西班牙人的朋友；任何一個士兵或傳教士獨自步行在他們村落之間都很安全，並且每一天皆可沿著海岸或沿著河流自這個要塞到另一個要塞經商透過他們的村落做生意買米」。

「過去習慣於戰爭且每一天都要去獵取人頭的原住民，現在因為對西班牙人的敬畏，不敢如此做，都很溫順；只有噶瑪蘭(Cabaran)人仍保有這種習俗，他們在收割的時節埋伏在淡水河道從乘船或是舢舨者身上割取他們所能割取到的人頭就像他們去年對一個Sangley人所做的一樣：多如雨點般的箭落在他身上，即使西班牙人帶著滑膛槍仍然無法與之對抗。」。這些噶瑪蘭(或中國人所稱的蛤仔難Kapchulang，以及現在日本人所稱的宜蘭Giran)原住民是最勇敢及高傲的，今日的泰雅(Ataiyal)部落跟他們一樣，是他們的子孫，他們永遠不會屈服於西班牙人之下，也不可能做他們的朋友，只有武力方能降服他們。

1632年在「聖週(Semana Santa)期間有一艘載有約50個人，其中包含西班牙人、Sangley人及日本人的舢舨出發航往馬尼拉，所有的人都遭到屠殺。之後30個西班牙人及一些少許的卡加揚人展開報復行動處罰他們，燒燬他們七個小村莊並殺死10或12個噶瑪蘭人，直到無法再進行報復行動為止；最後徒留因為恐懼而與我們為善的原住民傲慢的嘲弄」。

在噶瑪蘭下方一點的地方東邊有另一聚落，就是巴蘭古斯(Barangus)及帕提布(Patibur)人的聚落，在1628年他們同樣捕獲一艘舢舨，殺死船上全部人員中的10個西班牙人僅留下一個男人及四個女人為活口，其中一個女人因害怕落入這些野蠻人手中而自縊。這些食人聚落「將死者的血裝滿磁瓶，然後喝它並且吃他們的身體」，他們在受到對等處罰時，也承認這些陳述。

「自淡水要塞沿著河流上溯，約二至三里格處，河流分成兩個分支，一個稱之為Kimazón(原文照抄，即指今日之基隆河)(中國人稱之為番仔溝Huan-a-kau)。1632年3月西班牙人在此發現一條通往主要要塞(基隆)的道

路。該項探險行動有超過80個人參與，沿途他們見到滿天星斗在其頭上，晚上八點左右還有一個遠較月亮還大的奇異標誌在天空，這一現象持續了約45分鐘，他們為此感到無比振奮與高興」。¹¹

西班牙國旗在福爾摩莎島北方山頭飄揚後有八年了，從所發生的事來看偉大的國家西班牙總是有好運庇護。1634年在基隆擔任都督以致力增加祖國榮耀和宣揚天主教真理聞名的勇敢士官長阿隆索·賈西亞·羅美羅(Alonso García Romero)對貿易給予很大的幫助，使得中國及日本戎克船容易進入；降服許多部落，讓他們承認西班牙統治，並對嗜血嗜瑪蘭人所犯的罪行施以鐵腕處罰，他的公正在有罪人身上留下不可磨滅的記憶，對服從與恭順的人則施以慈悲與善心。

他的治理是福爾摩莎島上最佳的，他在任期間，傳教士能深入許多村落為許多人受洗幫助福音宣傳並確保所征服土地的安定。

1635年菲律賓島上的最高政府是由塞巴斯提安·巫它度·德·科奎拉(D. Sebastián Hurtado de Corcuera)負責掌理。根據他的吹捧者所言，他具有強大才能與軍事能力，但是毫無疑問的他對政治的外行、固執己見、重個人想法勝於大眾利益，使得他一開始就不屑擁有福爾摩莎島，不怕出賣祖國利益，因此在他統治期間，西班牙失掉對福爾摩莎島的統治。¹²

在記載如此悲傷的結局前，我們先談其他發生在福爾摩莎島上不愉快的事物。曾皈依在瑪麗亞披風保護下的西拿聚落在1636年因為忌妒他們精神導師聖道明會的法蘭西斯克·瓦艾斯神父(V. P. Fr. Francisco Váez)熱心於他們當時敵對的鄰近部落班道(Pantao)的福音傳教工作而將之殺害。西拿的原住

11 請參考附錄中艾斯奇威爾神父的報告。

12 日期是1636年6月26日，由馬尼拉法院官員多明哥·德·威亞西斯(Domingo de Villasis)及D·B·德·艾斯卡羅那(D. B. De Escalona)簽署，他們保留了一系列控告塞巴斯提安·巫它度·德·科奎拉的文件，其中一部份的敘述如下：「財政當局已為兩艘船進行相關準備工作以便出發前往新西班牙，但在巫它度·德·科奎拉的命令下停止相關工作，他於去年的6月24日起擔任總督一職，因此此城市(馬尼拉)附近的鄰近人民預感今年的貿易將會衰微。財政當局準備的兩艘船並沒有出航，該城市的皇家財政(Real Hacienda)當局的相關人員也有同感，但是上述總督並未告知我們這些船隻為何未出航的原因，且他對他自己的想法及所有行為非常堅持，敵視所有對他的質疑，沒有人可以改變他的決定」。

印地亞檔案館, Filipinas, legajo 30。

民害怕因他們的罪行遭到西班牙人的懲處，紛紛逃進森林，遷往今日中國人的小城鎮八芝蘭(Patsie-ná)及北投(Pak-tau)；因為對耶穌的愛，教會修士忘了這個傷害並取得都督完全的諒解，讓西拿原住民知道他們自己的罪行，並使他們其中某些人返回他們原來的聚落地居住。在當時由於按期提供西班牙人所需物資的中國舢舨遲遲未抵達，各要塞皆遭遇食糧短缺的窘況，所以都督命令一些士兵前往較西拿聚落地理位置更高的較友善村落以合理價格購買所需的米。熱心的傳教士路易士·慕洛(P. Luis Muro)想利用此機會勸誘一些仍未返回他們村落的頑劣西拿原住民回到原居地，受其感召，有些士兵加入這一遠征行列。當他們正在收購稻米的同時，他們所等待的中國舢舨也抵達港口，因此除了四名士兵留在當地保護入倉的稻米外，其他人皆因都督的命令，未繼續進行採購工作而直接返回要塞執行其他任務。

一些與西班牙人為敵的野蠻人心懷邪念想謀殺那些無人保護的西班牙人，如果督都沒有及時得知這一消息派二十名士兵及四十名搬運工去保護他們的安全，他們可能得逞；不幸的是，當乘載他們的船隻抵達河邊時，所有人因遭遇三百多名暗中埋伏戰士的伏擊而大吃一驚，如雨般落下的箭使得二十四名男性、兩名女性及一些服務的僕人中箭身亡，路易士·慕洛神父也因此自己的熱心而犧牲。

這一罪行並非神不知鬼不覺，在受到人為處罰的同時，這些野蠻人原住民也遭到上天對他們的懲罰，沒多久該村落就被一場狂風暴雨夷為平地，在混沌水窪中躺著二十九具屍體，這些無辜人所流的血是神的懲罰。

用土、木樁柵及長圓木所建成的聖·多明哥要塞，曾經遭到原住民燒毀破壞，所以法蘭西斯克·艾南得斯(Francisco Hernández)，在1637年擔任淡水長官時，下令用更堅固的材料重建此要塞；但是隔年菲律賓總督科奎拉因對和樂(Jolo)及棉蘭佬(Mindanao，又稱岷答那峨)島的原住民開戰，下令法蘭西斯克·艾南得斯摧毀該要塞，否則他將遭到不幸的懲處，事實上後來法蘭西斯克·艾南得斯的確因未在其他事務上服從他的命令，而被放逐到特爾南特島(Tarnate譯註，應是Ternate的筆誤，該島位於摩鹿加群島)。

無視督都的刁難和羞辱，此時基隆與中國人及日本人的貿易正處於巔峰，「當舢舨到的時候，他們竭盡所能取走所有的貨物放進倉庫，他們明目張

膽地進行，有恃無恐地花時間進行此事直到生理人(Sangley)被激怒，西班牙人才給他們想要的東西」，據說，「沒有人能否認中國人、日本人帶來許多的商品，這眾所皆知；如果有一天有二十艘之多載滿商品的舢舨入港，而正好羅佩斯·德·安都易技師(In.º Lopez de Anduir)正好要離開，就會有一艘滿載所購商品的船同時離開此地。沒錯，中國人知道這裡有錢可賺，因為這裡沒有舢舨就沒有財富，而中國人來這裡為的是可以獲得很好的利潤且這裡離他們的家鄉也很近」。¹³

因為總督科奎拉先生和一些委員會委員個人差勁的態度和對祖國事務的興趣缺缺，淡水港先被下令放棄，之後是基隆要塞的所有防禦工事被下令破壞還有有兩隊士兵駐守防衛的主菱堡也幾乎被完全拆掉，所以福爾摩莎島上的西班牙人包括傳教士們在內，士氣開始衰退，他們清楚知道這樣如此不愛國的措施會使西班牙的影響力消失於此；這種遺棄土地結束統治的想法不是高貴的西班牙人會有的。

1639年保羅密諾(D. Palomino)被派往基隆，他收到一份緊急命令要求他拆除破壞自西班牙殖民起就建造的防禦工事，儘管在保羅密諾與傳教士們互相協商後認為已拆掉的部分已經足夠了，陽奉陰違這一命令，沒有拆除得像科奎拉所要求的那麼多，但這些勇敢的征服者固有的勇氣已日漸消沉。

傳教士受到這些命令的束縛不再繼續推動宣教工作。西班牙的士兵和隊長曾讓卡斯提亞(Castilla，譯註，即為西班牙)的旗幟在鮮綠的福爾摩莎島巔飛揚、曾是為了對耶穌基督的宗教熱忱不顧性命勇敢航行的無知西方旅人、他們曾幸運地在那些土地上與那些居民相遇播下天主教的幼苗，為那些土地施洗冠上充滿愛意的名稱像是聖千里達(Santisima Trinidad，譯註，或譯為至聖三位一體)、聖地牙哥、聖多明哥、聖羅倫索(San Lorenzo)、聖卡塔莉娜海灣(Ensenada de Santa Catalina)；現在，在苦澀的遭背叛感覺下，他們羞辱暈眩軟弱地執行與他們愛國願望相背的命令，沉默地為早熟的挫敗哭泣，用祖國已破損的三角旗幟抹乾他們的淚水。

13 請參考附錄中奇洛斯神父的信件。

